

学、教育以及慈善活动中。总而言之，发展学的理论与实践表明，不应该继续把国际移民看成是一个国家落后的标志，也不能低估国际移民汇款和其他正常的跨国活动的作用，更不能忽视跨国社团组织日益复杂的网络以及他们与国家各级政府之间的互动，在任何关于移民祖籍国发展的研究中，我们高度重视移民社团组织的重要性。墨西哥和中国，都正在用各自的方式显示出这种组织的潜力是如何被开发出来的。

【论 文】

中国新移民的教育期望及其面临的挑战、制度限制和社会支持 ——以美国和新加坡为例^[1]

周敏^[2]，王君^[3]

【摘要】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就是教育。教育被认为是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有效途径。无论身处西方或东方不同的社会结构、不同的教育制度和文化环境，子女教育问题对于中国新移民家庭来说都是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我们的比较分析显示，美国华人家庭面临着种族歧视的结构障碍以及文化和代际的双重冲突，新移民除了依靠自身能力和经济社会背景，还通过华人社区的社会支持机制来缓解家庭内部的矛盾和代际冲突，使移民子女取得教育的成功。而在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新加坡，择优录取的教育制度和中国的应试教育有很多相同之处，中国新移民在子女教育上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制度和结构而引致的机会缺失，他们更多依靠自身的移民的超高端筛选，充分利用经济资本、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和跨国家庭资源应对新加坡的考试制度和过早分流带来的激烈竞争和焦虑。本项研究的结论是，海外华人移民子女教育的成功，除了新移民由于超高端筛选而有较高起点这个因素外，背后的原因不仅仅是有重教育的儒家文化和虎妈式的严管良教，还与多层面的移出环境和移入环境等结构性因素和社会支持机制密不可分。

【关键词】中国新移民，超高端筛选，教育期望，文化冲突，代沟，族裔资本

一、引言

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就是教育。传统的中国社会重视读书，信奉“书中自有黄金屋”。贫苦出身的读书人可以靠自己的才学和“十年寒窗苦”，通过科举制度走上仕途，光宗耀祖。现代的中国社会也同样重视教育，视教育为取得薪酬优厚的工作机会和较高社会地位的阶梯。中国当今的高考制度，印证了“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使成千上万不同家庭背景的高中生通过考试被大学择优录取，为他们实现个人的职业梦想铺平了道路。在中国，教育是每个家庭的头等大事，是父母养育孩子的最重要的责任。子女教育程度的高低不仅是衡量父母社会地位的标准之一，也

¹ 本文曾刊于《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1至9页。

² 周敏（Min ZHOU），社会学博士，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社会学教授、亚美研究学教授、王文祥伉俪美中关系与传媒基金讲座教授；中国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兼职教授。

³ 王君（Jun WANG），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社会学博士生。



是衡量育儿成功与否的标准之一。在海外，华人家庭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亦是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儒家传统的孝顺、好学、刻苦、自律通常是海外华人教育子女的规范和行为准则。不少华人移民父母说自己飘洋过海、含辛茹苦、日夜操劳是为了子女能够顺利地融入移居国主流社会的中产阶级，丰衣足食，出人头地。^[1]

海外华人被视为全球最重视教育的族群之一。在当今很多国际移民的接收国，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华人青少年都在教育领域脱颖而出，出类拔萃，获得了有目共睹的教育成就。^[2]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教育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移民群体成员及其子女取得向上社会流动（upward social mobility）的较为公平、可预测性强、且卓有成效的途径。教育成就的客观指标，如毕业院校、学历、专业和平均成绩等关系到移民及其子女的职业前景和经济收入，是直接影响移民在移居国生活稳定、融入和向上流动的重要因素。对华人移民家庭来说，子女的教育无疑是家庭生活的中心议题。来自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华人移民父母大多对子女的教育给予极大的关注，期望子女取得教育的成功，以保证未来职业的顺利发展。移民父母要想实现对子女教育的超高期望，甚具挑战性。原因是，移居海外导致移民的家庭结构深刻变化，家庭内部不仅有代际冲突，还有跨文化冲突。此外，移居国的教育体制，主流社会环境和族裔社区的社会结构以及语言文化问题等，都对华人移民子女的教育问题产生重大影响。

本文的中心议题是：在东西方不同文化的移居国社会环境中，中国新移民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是否不同？他们面临着哪些挑战和制度限制？他们运用哪些社会支持机制来应对挑战、解决困境，从而实现预想的教育期望？本研究以美国洛杉矶和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家庭为例，根据参与观察，大众媒体报道，以及有关历史和政策文献等资料的分析，从父母的角度去探究此议题。

二、新移民产生的背景：移出国与移居国因素

学界对于“中国新移民”的概念至今还没有严格的定义。一般来说，这一移民群体泛指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从中国大陆移出的国际移民，这是一个十分庞大而多元的群体。根据联合国和国内学者的数据，1978年改革开放后从中国大陆移出的国际移民高达一千万人。^{[3][4]} 这些中国新移民虽遍布世界各地，但多数流向欧美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等，以及亚洲发达国家，如新加坡和日本等。关于国际移民在移居国的社会适应或社会融入研究的一个影响力较大的分析框架，是关注祖籍国移出环境（contexts of exit）与移居国接收环境（contexts of reception）中各种宏观、中观和微观因素互动所产生的影响。^[5] 基于这一分析框架，祖籍国移出环境的考量因素包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政策、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等宏观因素，还包括移民社会网络和个人的社会经济背景等中观和微观因素。移居国移入环境的考量因素包括移居国移民政策，主流社会的结构与华人族群在其中的地位，华裔社区组织的发展以及个人、家庭和族群的社会经济背景等。

（一）1978年的改革开放与中国国际移民潮

就移出环境而论，当代经久不息的中国国际移民潮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直接结果之一。这一轮

¹ 周敏，“美国移民家庭的代际关系与跨文化冲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

² Jennifer Lee, Min Zhou, *The Asian American Achievement Paradox*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15).

³ 王望波、庄国土，《2009年海外华侨华人概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

⁴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 DESA), *Total Migrant Stock at Mid-year by Origin and Destination* (Washington, DC: UN DESA, 2017). <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data/estimates2/estimates17.shtml>, access on December 31, 2018.

⁵ Alejandro Portes & Ruben G. Rumbaut, 1990, *Immigrant America: A Portrai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大规模的移民潮由几个方面的结构因素促成。第一，改革开放使大量的外资涌入中国。1980年代，超过四分之三的外资来自于海外华商。海外华商资本的注入，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激活了休眠多年的海外亲属联系和跨国移民社会网络。第二，中国政府撤除了国际移民的制度障碍，放宽了取得护照的条件，简化了出国手续，允许有海外亲属关系的中国公民合法移民海外。第三，中国放宽了海外留学和研修政策，资助成千上万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到海外学习和学术交流，同时也允许国人自费到海外留学。最初自费留学的资金基本上来自留学生的海外亲属。1990年以后，不少经济能力较强的家庭也有能力资助子女出国留学。第四，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全球化，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以后，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的海外投资迅速增长。这些宏观和中观层面的结构因素，加上一些接收国放宽移民政策和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的新移民潮推波助澜，使之经久不息，方兴未艾。^[1]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移居海外的老华人移民相比，中国新移民有几个明显不同的特征。一是来源地更为广阔，早期的老移民大多源自广东和福建侨乡。当今的新移民则来自中国五湖四海的大小城市和乡村，社会经济背景更为多元。二是早期的老移民大多是仅有小学文化程度，还有文盲的农民和低技能劳工，而今新移民的平均教育水平和劳动技能远远高于祖籍国总人口的平均水平（也高于一些移居国总人口的平均水平）。如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专业技术移民的比例，占在美国的中国新移民的50%以上，占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的75%以上。三是居住模式更为分散。即使还有少数新移民仍然聚居于唐人街和华人移民聚居郊区（美国），大多数新移民混居于中产阶级社区。四是迁移目的更倾向于定居。早期的老移民移居海外是为了打工谋生，持暂居心态，希望最终能衣锦还乡，落叶归根。而今，新移民即便有跨国流动的机会和实践，他们大多是定居者，努力融入当地社会，落地生根。

（二）移入环境：美国与新加坡比较

就移入环境而论，美国是中国新移民首选的移居国，新加坡也是中国新移民较为偏爱的移居国之一。但两国的移民政策、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族裔社区的结构以及族群社会地位都差异较大。美国是中国新移民的最大接收国，吸纳了中国新移民全球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移民法修正案，废除了不平等的配额制度，确立了家庭团聚和技术移民的优先原则，由此引发大批亚洲移民包括中国新移民的涌入。美国国际移民政策的放宽，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加上前文提到的有利的移出环境因素，共同推进了中国向美国的跨国人口流动，使中国新移民浪潮四十多年来汹涌高涨。中国新移民的大量涌入，改变了美国华人社会的结构和人口成分。据统计，美国的华裔人口从1960年的24万人激增至1990年的160多万人，2010年的380多万人，并在2016年突破500万人。^[2] 当今的华裔美国人在教育、家庭收入和职业成就等客观社会经济指标的平均值已经超过欧裔白人，因而受到公众褒奖，被誉为“模范少数族裔”。但同时他们也被视为“永远的外国人”、“不公平的竞争者”和不同形式的社会歧视的对象。^[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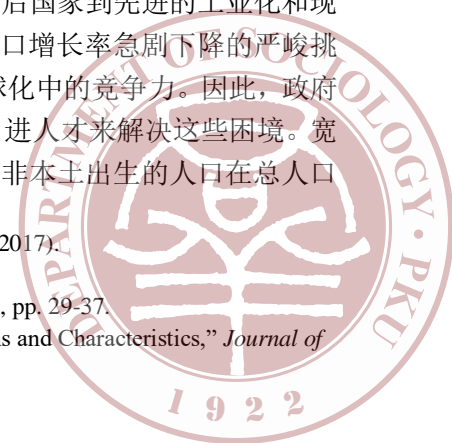
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特指1990年新中建交后移入新加坡的中国移民。^[4] 1965年国家独立后，新加坡仅用了三十年的时间，便完成了从“第三世界”的落后国家到先进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国家的跨越。1980年代末，新加坡面临科技人才紧缺和自然人口增长率急剧下降的严峻挑战，两者都直接威胁到新加坡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以及在经济全球化中的竞争力。因此，政府紧急调整经济和移民政策，例如提供奖学金吸引中国留学生，通过引进人才来解决这些困境。宽松的国际移民政策所带来的直接结果是新加坡人口的快速增长，导致非本土出生的人口在总人口

¹ Min Zhou, ed., *Contemporary Chinese Diasporas*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² Min Zhou, ed., *Contemporary Chinese Diasporas*.

³ Min Zhou, "Are Asian Americans Becoming White?" *Contexts*, Vol. 3, No. 1, 2004, pp. 29-37.

⁴ Hong Liu, "Transnational Chinese Sphere in Singapore: Dynamics, Transform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Vol. f41, No. 2, 2012, pp. 37-60.



中的比例不断加大。尽管在吸引国外人才和留学生的政策上并未明文限制某个族群，但是基于历史、种族和文化的因素，加上 1990 年以来新加坡与中国日益紧密的关系，中国新移民人口大幅增长。新加坡的主流报纸《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 曾报道，中国新移民的数量已从 1990 年代的数千人上升到当今的 100 万人。这些新移民大多数是已经获得了永久居民身份或加入了新加坡国籍的中国留学生、技术人才和投资移民。^[1]

新加坡深受英国殖民政治和文化以及国际移民历史的影响，是一个糅合了东西方文化但以华人为主导的多种族社会。出于种族和谐的需要，新加坡政府全力建构“新加坡人”的国民身份认同(national identity)。虽然中国新移民与新加坡华人源自相同的文化传统，并且因移民政策的超高端筛选(hyper-selectivity)^[2]而成功融入了国家的主流经济，但他们在社会和文化等层面的融入程度高低不等，仍然保留了浓厚中国特色的文化习俗和行为模式，以及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90 年至 2010 年的二十年间，中国新移民的大量快速涌入，对新加坡当地社会的就业、住房、交通、教育和医疗保健等方面造成了巨大冲击，引起了新加坡本地人的不满和排外情绪。一些新加坡华人视中国新移民为“他者”(the other)，既不同于本地华人，也不同于来自东南亚其它地区的华人移民。无独有偶，中国新移民在新加坡以华族为多数族群的多元社会中的“他者”身份，与美国华人(包括新移民)在华族为少数族群和白人至上的社会中的“他者”身份，都同样受到本土文化和社会的排斥。

三、中国新移民在移居国所面临的挑战

(一) 对子女的共同教育期望

无论是在以西方基督教新教文化为主导的美国社会，还是在深受儒家传统影响和中西文化交融的新加坡社会，中国新移民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没有明显的差异。他们都传承了儒家文化重视教育的思想，希望子女勤奋刻苦、学业优异，将来在职场中获得较好的职位，实现向上社会流动。在美国，华人移民家庭把教育当作子女向上流动唯一有效的途径，希望子女克服在移居国社会面临的障碍和种族歧视，通过个人的努力和选择实用学科，找到一份高薪的稳定职业，最终在主流社会立足。虽然美国华人新移民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多样化，但他们都对子女的教育抱有极高期望。美国华裔二代的学业成绩显示出与经典社会地位获得理论(status attainment model)相悖的结论，即无论移民父母的经济社会背景如何，子女的学业成就不仅优于其它移民子女，还优于本土白人学生的平均水平。^[4]这已经被证明是华裔移民子女学业优异的重要原因之一。^{[5][6]}新加坡中国新移民同样重视子女的教育，虽然这也有儒家传统的因素，但新加坡政府倡导的精英主义和唯才是用的原则，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加坡教育考试制度和教育竞争的激烈性。子女教育是很多中国新移民移居新加坡的原因和目的，他们不仅凭借自身优秀的教育、收入和职业背景在新加坡取得了较好的职业机会和中上层的社会地位，他们更期望和相信子女将来能够通过优秀

¹ 周敏、刘宏，“海外华人跨国主义实践的模式及其差异——基于美国与新加坡的比较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3年第1期，第1-19页。

² 超高端筛选(hyper-selectivity)是李智英与周敏在《美国亚裔成就悖论》(The Asian American Achievement Paradox)一书中提出的重要概念。指的是在某移居国的某个移民群体的平均教育水平(大学本科四年以上的学历)既高于移出国的平均水平，也高于移入国的平均水平。

³ Jennifer Lee & Min Zhou, *The Asian American Achievement Paradox*.

⁴ Min Zhou & Carl L. Bankston III, *The Rise of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16).

⁵ Ruth K. Chao, “Beyond Parental Control and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Style: Understanding Chinese Parenting through the Cultural Notion of Training,” *Child Development*, Vol. 65, No. 4, 1994, pp. 1111-1119.

⁶ Esther Lee Yao, “A Comparison of Family Characteristics of Asian-American and Anglo-American High Achiev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Vol. 26, No. 3-4, 1985, pp. 198-208.



的海外教育背景和教育资本，获得理想的职业和全球流动的机会。

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新加坡，中国新移民对子女的期望同时也充满矛盾。具体体现在：父母一方面希望子女在移居国接受教育，能够尽快的跨越语言和文化障碍，融入主流社会；另一方面，又希望子女能学习和继承华人的语言文化。他们运用各种机会和资源向子女灌输中华文化传统，加强族裔身份认同和提高母语能力。对于移民父母来说，这不仅仅是希望子女保留中国文化传统，同时也是理性和实用主义的选择，他们认为这可以帮助子女提高未来在祖籍国、移居国以及全球职场中的竞争力和社会流动，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二）在社会融入过程的共同困境

移居海外是个充满挑战和压力的过程，移民所经历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情感等方面的巨大变化，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他们及其家庭在移居国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以及工作与生活。中国新移民在适应和融入移居国社会时主要面临以下的困境。

1. 语言和文化障碍

在独尊英语的美国社会，英语水平欠缺是影响中国新移民适应和融入的主要障碍之一。不谙英语或操较重口音的英语不仅时常导致新移民在职场和社会生活中被歧视和边缘化，在家庭中也出现父母权威减弱、子女中文水平低下的现象。在新加坡，虽然新加坡社会以华人为主导，也沿袭着儒家文化中的孝顺和尊从长辈等传统。然而，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新加坡社会以英语为主要的官方语言，其社会制度建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均体现了中西融合的特点，教育、商业和法律实践都沿用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惯例并偏向使用英语。年轻一代的新加坡华人与早期的华人移民和现代的中国新移民更为不同，他们强烈认同“新加坡人”的民族国家身份，对祖籍国中国基本没有归属感，缺乏华族文化认同，华文语言和应用能力日渐减弱。尽管中国新移民具备移民政策高端筛选的优势，拥有相对优秀的平均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和职业背景，但他们在语言和文化方面仍处于不利的地位，需要不断地调整 and 适应新加坡独特的文化环境。

2. 移居国社会的结构障碍

尽管中国新移民在美国和新加坡分别处于更加开放、宽容、平等的社会大环境，但是两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结构，仍然使新移民经常遭遇明显的或隐性的社会偏见和种族歧视。他们的专业文凭、职业经验和资质往往不被认可，同时，他们缺乏族裔关系网络以外的大社会的制度支持，导致新移民初到移居国时处于弱势地位。对美国的中国新移民来说，不仅要努力工作迅速适应移居国的职场和社会，还须通过亲身的体验和经历，教育子女加倍努力，避免蒙受社会歧视和制度的限制。^[1] 此外，中国新移民父母还特别强调子女要克服与主流社会白人子女竞争时作为少数族裔的劣势，以双倍、甚至多倍的优异成绩来应对社会竞争。^[2] 在新加坡，中国新移民迅速大量涌入，对新加坡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由此引发了本地人对中国新移民的厌烦甚至怨恨情绪，加深了原已存在的新移民“他者”弱势地位和社会歧视。近年来，新加坡移民政策迫于公众压力逐年收紧，根据移民的教育、职业、收入、居住年份等因素严格区分他们在教育、住房、职业等方面的福利与机会，为新移民的移居和适应设置了更多的结构障碍和制度性约束。

（三）中国新移民家庭结构和内部关系的变化

1. 美国华人移民家庭的“代沟”问题

移居海外中断了传统的扩大家庭（extended family）结构及其社会支持网络，父母管教和约束子女的能力也因文化和语言障碍而被削弱。二战后，唐人街内的大多数华人移民家庭或是隔洋

¹ Barbara Schneider, Yongsook Lee, "A Model for Academic Success: The School and Home Environment of East Asian Students," *Anthropology & Education Quarterly*, Vol. 21, No. 4, 1990, pp. 358-377.

² Sau-Fong Siu, "How Do Family and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Affect Children's Education Achievement? The Chinese-American Experience," *Equity and Choice*, Vol. 8, No.2, 1992, pp. 46-49.



的“分裂家庭”(split households),或是虚构家庭(fictitious family),完整的核心家庭为数不多。^{[1][2]} 主流社会歧视华人,在学校、职场以及社会等方面设置了各种种族隔离的障碍。华人父母别无选择,为使其子女不受种族歧视的直接伤害,两代人被迫生活在唐人街狭小的族裔空间里。他们无论是个人还是家庭,都与华人社区有着各种密切的族裔组织关系,相互依存,对族裔社区既依赖又受控,价值观和言行举止均受到社区文化的制约。当时的华人家庭内部虽有潜在的代际和文化冲突,但族裔社区的特定环境和社会关系,避免了冲突的发生或使冲突得以缓解。1960年代的美国平权运动(civil rights movement),在法律层面禁止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为华人移民及其子女融入主流社会、取得向上社会流动提供了必要的前提。1980年代以来,中国新移民的家庭结构以完整的核心家庭为主。新移民不再受困于唐人街和族裔经济,大多数人散居在白人为主的中产阶级社区,就业于主流职场。但无论其社会经济背景如何,大部分的新移民家庭都是双职工家庭,父母很少有时间陪伴照料子女,致使不少孩子成为脖子挂着钥匙的“钥匙孩子”(latchkey children),课后单独在家。父母与子女间缺少必要的沟通,父母的权威因为生活在新的英语社会环境里而大打折扣,代际和文化冲突在缺乏族裔社区缓冲的情况下屡见不鲜。^[3]

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使移民家庭的“代沟”(generation gap)和代际冲突问题尤为突出。在美国,华人移民家庭强调长幼尊卑、孝顺和尊重权威等儒家传统,与西方家庭崇尚的自由平等、个人奋斗等价值观格格不入。中国新移民家庭与主流社会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及移民父母与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子女之间同化步调的不一致,以及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差距,导致了代沟的形成。以如何定义“美国梦”为例,大多数的成年新移民、特别是为人父母的新移民忙于工作和养家糊口,对“美国梦”的定义比较实际,即拥有自己的房子,自己能当上老板,子女能进名校。虽然他们十分努力寻求打入主流社会,但大多朝着这三大目标而奋斗。^[4] 而他们的子女们则更为雄心勃勃,不仅追求有形的和物质上的成功,更要寻求精神上的满足。他们追求的是如何成为与众人无异的不受歧视的美国人。还有就是能够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地追寻自己的梦想。子女在美国文化影响下成长,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与父母的期望大相径庭,这主要由移民父母与子女的文化鸿沟所导致,文化鸿沟则进一步导致了家庭代际关系紧张,加剧了两代人之间的分歧和冲突。

2. 新加坡中国新移民家庭的跨国隔代抚养现象

中国新移民大量涌入新加坡是1990年代以后的现象。新加坡中国新移民的人口成分不像美国的中国新移民人口那样多元化,主要由留学生、专业人士和投资移民的中产阶级高端人才构成,年龄结构偏中青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中国新移民的家庭由夫妻两人转变为夫妻和子女构成的逐渐稳定的核心家庭。在养育婴幼儿和学龄孩子的阶段,这些新移民家庭特别需要家庭和社会的支持。初为父母的新移民希望给子女提供成长和教育的稳定环境,他们通常会在这个阶段决定转变国籍、取得新加坡的公民身份而长期定居下来。但由于新移民在新加坡缺少扩大家庭和社会网络的支持,双职工的时间和经济安排不能满足照顾孩童的需要,新移民往往要求助于在我国的父母,让双方父母持探访签证轮换来新加坡照看孩子。尽管新加坡有为18个月以上的婴儿开设的幼儿园,也有雇用外籍女佣的社会惯例,但新移民倾向于选择家庭的帮助和支持,目的是在经济上和孩童的养育和安全上得到多一重保障。这种跨国隔代抚养现象在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家庭中

¹ Evelyn Nakano Glenn, "Split Household, Small Producer and Dual Wage Earner: An Analysis of Chinese-American Family Strategi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Vol. 45, No. 1, 1983, pp. 35-46.

² Min Zhou, *Chinatown: The Socioeconomic Potential of an Urban Enclave*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³ Min Zhou, "Negotiating Culture and Ethnicity: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in Chinese Immigrant Famil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Ram Mahalingam, ed., *Cultural Psychology of Immigrants*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2006), pp. 315-336.

⁴ 周敏,“美国移民家庭的代际关系与跨文化冲突”。



非常普遍，是新移民和自己父母一代理性安排的结果。新移民的父母跨国来与子女相聚，目的不是颐养天年，而是承担家庭责任，辅助子女的核心家庭在移居国建立新生活，让他们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在职场打拼，加速向上社会流动。由此，这种三代共同生活的家庭代际关系更为复杂，除了新移民与子女的这层关系，还加上新移民与父母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父母跨国流动的暂时性、老中两代人养育观念和方法的差异、以及共同生活而引起的分歧和冲突等。

与美国的中国新移民家庭对比，新加坡的新移民家庭有几个不同的特征。第一，新移民夫妻大多是高教育和高技能的专业人士，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第二，持永久和临时（工作）签证的中国公民的比例较大，因而在新加坡落地生根的不确定性较高。第三，子女大多尚处幼年和童年阶段，青少年的比例较低。第四，三代的扩大家庭比例较高，但新移民子女的祖父母大多属于暂居性质。

四、移居国的制度限制与社会支持机制的作用

美国和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都期望子女能上名校，成龙成凤。这种超高的教育期望能否实现，受到两国不同的教育制度、社会环境和社会支持机制的影响。

（一）移居国的教育制度和大社会环境

1. 美国的教育制度及“模范少数族裔”刻板印象的负面影响

美国实行自由主义开放式的教育制度，没有全国性的中央教育体制，也没有课程设计、教材、教学方法和考核制度等方面的统一标准。美国的教育制度鼓励学生发现自我，发展自我，注重教育的过程，注重动手能力和批判性分析思维的培养。家庭和学校都相信天赋和个人能力是个人学术成就的决定因素，主张因人而异的人性化教育，分数和名校学位不是衡量教育成功的唯一标准。中国新移民一方面充分利用美国自由开放的教育制度，另一方面则限制子女的学业选择，要求他们选择最为实用的学科，期望子女通过勤奋努力获得最好成绩。重视教育且经济社会背景较好的中国新移民，能够选择好的学区，充分利用所属的公立中小学，使子女能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在购买房产时重点考虑“学区”因素，就是学区制对移民家庭的教育策略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个具体体现。

在美国，由于国际移民的超高端筛选，华人族群的社会经济地位有显著的提高。根据 2000 和 2010 年美国的人口普查统计数字来，华人族群的教育、家庭收入和职业成就等指标的平均水平不仅远远高于美国总人口的平均水平，也优于白人族群的平均值。^[1] 华人子女以其优异的教育成就沿着社会阶梯迅速向上流动。社会、学校和媒体也因此而把华裔（和其他亚裔）称之为“模范少数族裔”，形成新的刻板印象。这无形中造成了社会对“模范少数族裔”的华裔不平等的评价标准和不现实的期望，强化了他们天生就适合从事数理化科研和工程技术的社会偏见。此外，这些观念不仅给亚裔、包括华裔子女追求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以外的职业制造了实际和潜在的障碍，还迫使亚裔族群和家庭本身对下一代的期望也更多的局限在被主流社会公认的适合亚裔的领域，把在这些领域的学业成就当作将来职场就业成功的敲门砖。^{[2][3]} 移民父母对子女教育的相关问题也因这种局限性而产生严重的焦虑。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使华人父母认为其子女必须大幅超越白人，才可能获得与普通白人的同等的机会和职位。另一方面，华人父母认为名牌大学的文凭是将来获得职场高薪工作的首要条件。由于名校录取亚裔（包括华裔）的名额有限，亚裔学生之间的竞争使考量标准更为严格、要求更高，要想在同等优秀的学生中脱颖而出，必然

¹ Jennifer Lee & Min Zhou, *The Asian American Achievement Paradox*.

² Jennifer Lee & Min Zhou, *The Asian American Achievement Paradox*.

³ Min Zhou, "Are Asian Americans Becoming White?"



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时间与金钱，这无疑加剧了原已激烈的教育竞争，加深了华人移民家长的焦虑。

2. 新加坡的教育体制及其对中国新移民的压力

新加坡政府采用实用主义的策略设计教育制度，信奉精英主义，采用唯才是用的原则，通过考试和分流制度来因材施教，导致家庭、学校和社会把高分数和名校学位与教育成功等同起来，大家都认为只有努力和勤奋才是取得好成绩的决定因素。虽然教育分流和竞争有利于选拔优秀人才，为经济发展服务，但也造成了人们过度参与教育竞争和焦虑的社会环境。例如，新加坡被称为“补习国家”（tuition/enrichment nation）¹，私人补习产业即“影子教育”产业（shadow education industry）发展成熟，能满足不同经济背景家庭的需要。新加坡统计局 2016 年的数字显示：新加坡家庭用于课后补习的投资超过 11 亿新元，趋于 2005 年 6500 万新元的两倍；120 万个家庭的孩子要去补习中心学习，占总家庭数的 90%；40% 的学龄前儿童会参加补习，上小学以后，补习的学生则达到 80%；介于 13-19 岁的孩子中，85% 的小孩每周要课外补习 4 小时以上。² 考试和过早的分流，包括小学三年级的“天才班考试”（Gifted Education Programme, GEP）和小学六年级的会考（Primary School Leaving Examination, PSLE），在教育路径上对孩子未来的机会和资源的获得至关重要，因此，新加坡家庭和父母（包括本地人和移民）都会不遗余力地投入到子女的教育开发中，成为教育竞赛的参与者，无形中加剧了“怕输”（kiasu）的社会心态³。

激烈的教育竞争和焦虑的社会环境，使新移民更加重视和强调教育结果。移民父母们认为，如果在教育分流中落败，必然会导致子女失去优越的教育资源和学业前途，即使将来有机会迎头赶上，也会需要更多倍的时间和努力。另一方面，慢流的孩子会被贴上能力和智商较差的标签，未来只能成为新加坡社会精英的追随者和服从者。新移民虽然具备超高端筛选的优势，却缺少主流社会所拥有的资源和缺乏社会网络的支持。同时，移民身份对教育机会和资源的限制，也使他们在教育竞争中处于劣势。因此，为了应对教育考试中重要的分流（GEP 和 PSLE），新移民家庭和父母不得不把子女教育，包括中小学、甚至学前教育，作为“社会工程”，投入大量的金钱和时间，使很多父母处在焦虑甚至痛苦当中。

（二）社会支持机制

由于美国和新加坡的教育制度和主流社会环境不同，新移民在子女教育方面虽然有相同的教育期望和焦虑感，但他们的应对策略因地制宜，通过不同的社会支持机制达到预想的效果。

1. 美国：基于族裔社区的社团组织和社会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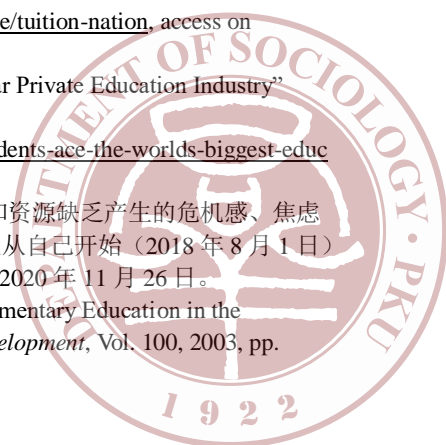
在美国，族裔社区的有形和无形的教育资源成为中国新移民家庭应对挑战的重要社会支持机制。⁴ 随着华人社会的转型，华人社区内服务于华人家庭和子女的非营利社团组织迅速发展。首先，华人社团组织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可以帮助华人父母在族裔社区的环境中对子女进行中华文化教育，强化家庭价值观、处世准则以及行为规范。华人社团组织中最重要的非营利组织之一

¹ “Tuition Nation.” *The Straits Times*, July 04, 2015. <http://www.asiaone.com/singapore/tuition-nation>, access on November 26, 2020.

² Amanda Wise, “Behind the World’s Best Students Is a Soul-Crushing, Billion-Dollar Private Education Industry” (December 12, 2016), <https://qz.com/860356/pisa-singapores-competitive-private-tuition-system-helps-students-ace-the-worlds-biggest-education-test>, accessed on November 26, 2020.

³ “怕输”来自闽南语 kiasu（惊输），特别指当代新加坡人由于生存环境狭小和资源缺乏产生的危机感、焦虑和攀比、以及从众的心理和行为等。参见《联合早报》社论：改变怕输心态先自己开始（2018 年 8 月 1 日）<https://www.zaobao.com.sg/zopinions/editorial/story20180801-879771>，浏览时间 2020 年 11 月 26 日。

⁴ Min Zhou & Xiyuan Li, “Ethnic Language School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upplementary Education in the Immigrant Chinese Commu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Directions for Youth Development*, Vol. 100, 2003, pp. 57-73.



——中文学校，不仅满足华人父母对子女母语教育的需求，同时也开设其它的学习科目，如中国历史、文学、诗词、民乐等等，以利于华人子女进一步了解族裔传统文化和构建族裔身份认同。第二，华人社区以及各类社团组织的发展，也为华人父母提供了相互交往的族裔空间，既帮助他们重建族裔社会关系网，加强社会资本积累，也加强他们对族裔社区的归属感以及对社区认可的社会流动目标、途径和行为准则。美国华人的社会关系网的阶级成分十分多元，既有已经融入主流社会的中产阶级成员，也有被隔离在唐人街和族裔经济里低收入劳工，也有企业家和老板。跨阶级的社会交往有利于传递教育信息和分享教育资源。对于青少年来说，族裔社团和中文学校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的族裔社交环境，扩大了他们校外的朋友圈，也加强了他们的华裔身份认同感和自信心。同时，同族朋友的共同经历也让他们把来自父母的压力和代际冲突转化为刻苦读书的动力，改变了衡量他们学业成功的参照群体（从欧裔白人转为华裔）。第三，华人社区里除了非营利性的社团组织外，种类繁多的为移民教育服务的营利性商业团体，如课外补习班，才艺班，大学预备班等等，这些应运而生的族裔经济的新行业，迎合了父母害怕子女“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进一步刺激了父母对子女课外补习的需求。这些基于华人社区丰富的有形和无形的族裔资源，不仅为新移民的基本生计提供了帮助，还可以辅助移民子女取得教育成就，为他们在美国社会的发展和向上流动搭桥铺路。^[1]

2. 新加坡：新移民家庭的资源与跨国资源的调动

与美国的华人新移民相比，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则更多的依靠自身的经济条件和文化背景，包括良好的教育背景，职业状况和收入水平，以及可调动的家庭资源（如父母辈的支持）和跨国资源（通过跨国的职业、商务和社会文化活动所获得的相关资源、资讯、机会等等），来应对子女教育方面日益激烈的竞争和压力。新加坡移民政策的二分性和筛选性规定，只有高教育、高职业和高收入的专业技术移民才是新加坡政府希望引进的移民，才能得到 **Employment Pass** 或 **S-Pass** 的身份。中国新移民具备这种超高端筛选性，拥有较强的社会经济背景，这是他们抵达新加坡时就具备的优势，因而能够为自身和子女在移居国社会适应和发展创造更高的起点，客观上为移民个人和家庭的向上社会流动奠定了基础。

为了应对激烈的教育竞争，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借助于中国传统的文化资本，秉承儒家重视教育的传统思想，鼓励和鞭策子女刻苦学习，通过良好的教育在移居国社会获得稳定和高薪的职业，实现向上社会流动。使重视教育的儒家传统在新加坡的教育考试和分流制度中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中国新移民自身有较强的经济能力，可以全力投资于社会上已有的公共资源（公立中小学）和私人教育资源（影子教育产业）。例如，为了选择好的学校，新移民通常会购买毗邻名校的房产，以保证或增加子女进入名牌小学和中学的机会。此外，新移民为课后补习不惜投入大量的金钱，促使子女超前学习和拔高学习，参加各种价格不菲的才艺班和兴趣班等等。这种追求分数和应试能力的做法，主要原因是由于新加坡的教育竞争激烈，家长们不得不去适应现行的教育制度，因而往往随波逐流，从众而为，以求在教育考试的重要分流节点给孩子的胜出增加砝码。得益于本身大都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新移民还具备人力资本的优势。因而他们能给在激烈的教育竞争环境中成长的子女提供亲历亲为的辅导和支持，未来还有能力帮助和指导子女选择大学、专业和职业发展方向等等。

五、结论

本研究揭示，无论身处西方或东方不同的社会结构、不同的教育制度和文化环境，子女教育

¹ Min Zhou & Xiyuan Li, "Ethnic Language School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upplementary Education in the Immigrant Chinese Commu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问题对于中国新移民家庭来说都是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透过子女教育的问题，可以了解当代中国新移民在适应和融入移居国社会时所遇到的挑战和困境，尤其是移居国的教育制度、大社会环境以及变动中的移民家庭和族裔社区对新移民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影响。

我们的比较分析显示，在美国，由于华人移民在历史上经历过严重的社会排斥和种族歧视，主流文化与华人的儒家传统文化存在着剧烈的冲突，因此，华人家庭面临着文化和代际的双重冲突，使移民父母对土生土长的子女的管教更为复杂。新移民除了依靠自身的能力和社会经济背景，还通过华人社区的社会支持机制来缓解家庭内部的矛盾和代际冲突，使子女能够取得教育的成功。在新加坡，虽然中西文化交融，但儒家文化影响仍然较大，其择优录取的教育制度和中国的应试教育有很多相同之处，中国新移民在子女教育上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制度和结构而引致的机会缺失。新移民本身由于超高端筛选而有较高的起点，加上充分利用经济资本、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和跨国家资源，不遗余力地从时间、精力和金钱等方面投资于子女的教育，因而不得不从孩童阶段就开始未雨绸缪，应对新加坡的考试制度和过早分流带来的激烈竞争和焦虑。

这项研究的结论是，海外华人移民子女教育的成功，除了新移民由于超高端筛选而有较高起点这个因素外，背后的原因不仅仅是有重教育的儒家文化和虎妈式的严管良教，还与多层面的移出环境和移入环境等结构性因素和社会支持机制密不可分。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1期-第320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邮编： 100871
电子邮件： marong@pku.edu.cn

